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关于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史实及其辨析	蒯大富·刘才堂
【文献资料】	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	解学恭
【往事非烟】	鬼门关下的徘徊——被遗忘的5 1 6	王克斌
【书刊评论】	读《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冠 尘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关于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史实及其辨析

• 蒯大富·刘才堂 •

一、蒯大富的回忆

1966年7月30号晚上，又是贺鹏飞广播通知我：“蒯大富，晚饭后请到静斋来。”我吃完晚饭就到静斋去了。贺鹏飞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谈话，你就在甲所等着。”

后来他就把我带到甲所，那大概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7点开始等，8点、9点、10点，没有人来。11点我就找到贺鹏飞，质问他：“贺鹏飞，这是怎么回事？”

贺鹏飞说：“让你等，你就等着呗。”

11点了，我就坚持不住了，因为是夏天，犯困打瞌睡，到了12点、1点、2点，我靠在沙发上，穿个衬衣，就睡着了。

从7点到2点等了7个多小时。快到2点的时候贺鹏飞进来了，把我摇醒：“蒯大富，醒醒，快醒醒。”我赶快揉揉眼睛，用手擦擦嘴角。

“找你谈话的人来了，快坐好。”他说。

我就赶快坐好了。正说着门口就听到停车声、开关车门声、脚步声，然后有人进来了。

来的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这个形象当然是熟悉的。他在报纸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谁人不知，我不可能不认识。

当时我就蒙了，蹭的站了起来。周总理说：“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总理说：“你坐。”

后面跟了一个秘书，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孙岳同志。请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介草民，小人物，当时也是被整得发木了，见了总理不敢有丝毫的放肆。我就站在那儿没动。

还是孙岳走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吧。”

他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那沙发上，还是很紧张。

这不是什么谦让的问题，这是面对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王光美怎么了，也不知道刘少奇怎么了，一点也不知道。

你得非常佩服周总理的亲合力，就是和缓气氛的能力。他一开始先拉家常，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蒯大富。”

“几年级？”

我说：“三年级。”

“哪个系？”

我说：“工程化学系辐射化工专业902班。”

“老家是哪儿？”

我说：“江苏。”

“江苏什么地方？”

我说：“江苏盐城滨海县。”

“哦，你们那儿是新四军总部啊。父亲母亲是干什么的？”

我说：“他们全都是农民。”

“政治面貌呢？”

我说：“他们全都是共产党员。”

“那你们家是老革命啊。我也是江苏人，我在淮安生，长到14岁以后才到浙江去的。所以我们是老乡啊。”

哎呀，他就这么轻轻地一说一说以后，我就感到，没有任何的敌意啊，最起码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还称呼我“老乡”。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大人物面对面说过话，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了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我情绪也就放松了好多。这时我已经比较安静了，我也坐直坐正了。

周总理说：“那么我跟你讲啊，今天没有别的意思，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说，请你从6月1号到7月30号，不，31号，今天已经是31号的凌晨了，把你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给我讲一讲，是你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

哇，那我当然是毕恭毕敬。我说：“总理，我郑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下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和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还特别给我保证了一句，说保证听我讲完最后一句话。

孙岳专门作记录。人家就是不太大的一个笔记本，唰唰地就开始记。

我刚开始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自己也拿出个本子做些记录。

我从6月1号讲起。周总理基本上是在记，记得还比较详细，有的时候他听不清楚，还要我重复一遍，或者是哪个地方要强调一下结果是什么。因为事情刚过嘛，而且斗争那么激烈，全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啊。

我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每一件事都说得特别详细。

刚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咚咚地敲门。周总理说：请进。推开门，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周总理叫周伯伯，贺鹏飞说：“我们也不想听听蒯大富自述的话。”

周总理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贺鹏飞只好走了，我又继续讲。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听到第二次敲门，贺鹏飞又进来了。进来以后还是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自述的话。”

周总理生气了：“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以后贺鹏飞就再也不敢敲门了。我就一口气地讲，讲，讲。有的时候总理还发问，孙岳一句话都不说，就在那儿记。我从凌晨2点一直讲到5点。

5点了，天亮了。周总理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这样，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7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今天说的情况是你一个人经历的，而且呢，你被关了15天，所以在你被关的情况下清华有很多事情可能你不知道。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再谈一次，你找三个人，你自己找，你找谁我接受谁。支持你的、同情你的、帮助你的，反正就是你喜欢的人，你找三个人，但是呢，不要全找被关起来的人，不要全找被认为是蒯派的，也可以找同情你的但没有被关起来的人，对学校外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说，能不能做到？”

我说：“能。”

“那好。”周总理站起来握手之后就走了。

我按照总理指示找了三个人。一个刘泉，刘泉的爸爸是浙江省的副省长。还有刘才堂。这两个人都是被整得落花流水的，和我同时被关，在全校挨斗的。还有一个沈台平，沈台平是三个人中没有被抓的，我一放出来后就天天跟着我走，非常同情我，有好多事情他都帮过我。我找了这三个人。学校早就准备好了车，下午7点提前一刻钟，我们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厅，后来我才知道是在河北厅，我和他们三个人坐在那儿等。

接着周总理进来了，周总理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是你们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来听你们说话，你们没意见吧？”说得很认真的。

我说：“我向总理和两位首长汇报。”一个是总理，那两个是省委书记，你说我能反对吗？

“好，那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说。”

我、沈台平、刘才堂，加上刘泉，以我为主，就开始讲了。我说，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记得不准确的地方或者不完整的地方，你们补充啊，随时补充啊。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说：“你们补充蒯大富自述的话，看看他有什么说得不完善的地方，讲得不太对的地方。”

以我为主，他们三个人有时也插话。有的时候我说得太累了，他们就帮着我。我们四个清华学生向周总理和两位省委书记汇报，从7点讲到10点，又是三个小时。这样加上凌晨2点到5点我向总理做的汇报，在1966年7月31号这一天，周总理两次听我们汇报清华文化大革命情况，他总共听了六个小时。

最后我说：“总理，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完了，我向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也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说：“谢谢你了，非常感谢。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过来。你们吃完以后有车送你们回去。再见。”

我们和周总理加上两个省委书记告别以后，他们就走了。一会儿，来了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圆帽子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请你们到这边来吃夜宵。”

旁边有个小休息厅，在那里给我们一人面前放了一碗鸡丝汤面。哎呀，那汤面特别好吃。每人吃了一碗，香得不得了。吃完了以后，我们高高兴兴，又有车把我们送回清华了。

周总理找我汇报清华情况的时间是1966年7月31日。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我给周总理提供的实际是攻击王光美和刘少奇的炮弹啊。

近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了这两次谈话，但不知为什么，时间差了一天。《年谱》第1128页：（8月1日）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

我询问了一些同学，并参照有关资料，可以认定《年谱》的记载不准确。

□ 摘自蒯大富著《清华文革“五十天”》第二十节“周总理两次听我汇报”

二、刘才堂的回忆

关于周总理1966年7月对我们几位同学的亲切接见，我和刘泉同学有同样的感受。正如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文革初期1966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一次亲切接见，零距离感受到周总理的伟人风范。我退休后，随着年岁越来越大，我的一个愿望越来越强烈，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这次接见忠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因为这是周总理辉煌人生的一个片段，也是被人民和历史评价为“十年内乱、十年浩劫”的文革的一个片段。周总理已经仙逝，不堪回首的“文革”之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活着的晚辈不记录下来的话，这个片段将永久地湮灭了。这是对不起历史的啊！”

的确如此。关于这次接见，我曾应刘泉的邀请简单地写过一段文字给他。现在又应孙怒涛的邀请再详细写一写。虽然文革的烟云已经散去，事情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已仙逝多年，那次接见的详细过程各人记忆难免有些出入，但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次接见是清华文革的一个环节或片段，我想，简短介绍一下我当时所处的清华文革的背景情况还是有必要的。

◇ 背景情况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1班学生（大学三年级），团支部委员、副书记，班级生活委员，中共候补党员。1966年6月1日夜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火药味十足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名师生的

大字报，清华不少同学当夜就赶到北大看大字报，当天夜里清华园内就出现了大字报。6月2日起清华就乱了起来，也没有谁下指令就基本上停课了。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也只是到北大，或在本校校园里看看大字报。大约6月9日，北京新市委就派来了工作组，而且每个班都派了工作组的人来。当时学校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的副主任叶林，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和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化系的组长是张西薇（音méi，革命烈士张太雷之女）。

工作组一进我们系里，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原来的党团组织以及班级辅导员一律靠边站，重新指定了年级和班级的领导小组（工作组成员加学生代表）。像我所在的化901班、蒯大富所在的化902班党团支部统统靠边站。他们的工作形式就是像我们平时上课一样，按班级开展学习讨论和“批判学校修正主义路线”。学校系之间互相走动，或到外校走走看看是不允许的。文革开始后，我们都停课了，学生、老师自由走动，没人来管，他们说学生们像放羊一样。这在当时自然引发好动的清华学生们的强烈反感。

6月15日夜在图书馆旁二院的一间教室里，针对工作组强调要建立革命秩序的话题，我和我班同学舒仲用写学习心得的形式写了一篇大字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大意是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观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的视角、观点来观察我们清华文革中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们作为运动的其中一员，希望得到工作组支持、鼓励而不是束缚。我班同学张存和帮助抄写，数力系一个同学单景德也签了名，贴在了大礼堂前新建立的大字报棚区的科学馆对面位置。

没想到这篇大字报惹来了大麻烦。因为几乎在同时，化902班的蒯大富等几十名同学就在我的大字报旁边贴上了一篇题为《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落款的时间是1966年6月16日。不仅如此，蒯大富还在我的大字报标题处用钢笔写下了那段关于“夺权”的著名的批语：“革命的重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争，把权夺过来了。现在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显然很刺激工作组的神经。更令工作组恼火之处还在于：我在6月19日竟然又逆势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真是火上浇油。我的厄运由此开始：

6月16日白天我到大礼堂前看大字报时看到了惊人一幕：王光美在看我的大字报。陪同的，有清华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等。只见拍摄我的那篇大字报的相机闪光灯频频闪烁。现在我的那篇大字报的照片还在我处。王光美在报纸和新闻电影里出现过，我们学生看到过，我认出来了。我以为她个人来看大字报，觉得是新鲜事，但不会想到她在工作组中还担任领导工作。

然后班级和系里开始了对我个人和大字报的批判活动。不仅口诛笔伐，而且搞车轮战。我被叫去（当然不去是不行的）到逐个学生班级、逐个教师的教研组（那时都叫教研组，不像现在叫教研室）开辩论会。辩方只我一人。批得我十分疲惫。与校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判蒯大富的同时，工化系开批判刘才堂的大会。对我批判活动的高潮是在大礼堂召开全系批判会，题目是：“工化系批判反动学生刘才堂大会”。一个四好班（思想好、学习好、体育好、劳动好的班级）的团支部副书记竟然成了“反动学生”，说我是“黑帮藤腾（工化系党总支书记）的大红人，右派分子（指我的一位中学化学老师）的孝子贤孙”，岂不是又可气又可笑，怎能服人？工作组当时编辑的《大字报选编》收入了我的大字报和批判我的发言稿和大字报。

到7月29日，北京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北京新市委惊人地宣布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整我们的工作组将要撤离学校，但我们被抹黑的政治面目能还原清白吗，谁能来还我们清白呢？我像所有被工作组整的同学一样，看到一丝曙光，但心头的压力仍然很沉重。

◇ 接见情况的回忆

记得那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谁通知，怎么通知的，都记不清了。有人通知我晚饭后到甲所去，有首长要见我们。我们被打入另册的学生竟有首长要接见，大概不是坏事吧。是谁呢？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时想：爱谁谁，听天由命吧！

甲所是工字厅前的一个独立院落。有个很小的北门。记得在甲所门前徘徊的有我，有蒯大富。我们就等待在北门前面。相互间也没说什么话。

7月31日是盛夏，应该是等到大约9点以后吧，突然有人打开北门招呼我们进院子。我不是第一个进去的。当我进门后，突然见到灯光下有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快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仔细一看是周总理！我记得我和蒯大富等都高呼起了“周总理！”只是激动地握手。我们这个高兴劲儿啊，无以言表，只是喊“周总理！”我握住周总理的大手，感到十分绵软、温暖，这是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的！

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刘泉和沈台平。蒯大富是我们同一个系的，工作组又和他大会辩论，又大会批判他，很熟悉，但没有多少交往。之前对刘泉只知其名未见过其人，他和一些同学贴过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知名度。对沈台平我不熟悉。

很快我们进到一个小客厅里围成一圈坐下，总理坐在我们对面。这次接见的谈话内容记不清了。之所以记不清了，不仅是因为时间久远了，主要还是因为谈话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的政治内容。我感觉就是谈天，家长里短地闲聊，所以我们非常放松，没有任何顾忌。我记得总理介绍了在旁的秘书叫孙岳。始终没有听见孙岳说话，只见他沙沙地记录，我还注意到他有一堆削得很尖很规范的铅笔，此后我也更重视削铅笔的规范化了，我们工科学生都要削铅笔画工程制图的嘛。

第一次接见完后没有吃饭，约好第二天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谈。第二天晚上，还是我们几个人，乘一辆小轿车到了大会堂的某省的一个厅，一溜长条桌对面坐着周总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周总理向我们介绍了两位省委书记，又向两位省委书记介绍了我们这几位同学。周总理希望我们不要拘束。记得江书记是个大个子，谭书记是个小个子。这次接见完已是深夜，总理留我们吃了一顿夜宵。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猪肉肉皮汤，十分酥脆、绵软和鲜美。

我曾为此写过一首七律。诗曰：

难忘清华甲所前，伟人接见乐翻天。
温存话语三冬暖，绵软羹汤百味鲜。
未惧征途风浪险，应嗔后辈舵轮偏。
可尊领袖已仙逝，徒令吾曹泪似泉！

2014-1-3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三、《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编者附记

1966年8月4日晚，清华大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周恩来总理亲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到会。周总理发表的长篇重要讲话对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说：“党中央的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工作对我来说，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丝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又要像工作组一样，

也要撤回去。（笑声）这是在开会当中，在29日决定的，我30日就找了工作组和同学谈话，讨论，看了一些文件，看了一些大字报稿，到今天只有六天。我对清华详细的情况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的，只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周总理讲话全文见本刊zk0208a——编注）

周总理在8·4大会之前和之后对清华的文革运动有多关心？前几日，编者正好得到一份可信度极高的资料。梳理了一下，仅把周总理与清华有关的活动摘录如下：

7月29日，中央常委会上毛主席让周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7月30日中午12时约清华工作组谈话。下午3时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下午6时一刻约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

8月1日晨2时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上午11时半约王光美同志谈话。下午6时半与蒯大富谈话。

8月2日晨1时与叶林谈。上午11时约见王光美同志。晚7时半约叶林谈话。晚9时半见清华4个同学。

8月3日晨1时到清华找革委会（编者注：应是临时筹委会）成员谈话，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8月4日召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革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

下午4时三刻约叶林同志谈话。晚8时半约清华工作组部分同志谈话。

8月4日晚8时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8月5日下午1时1刻同清华工作组谈话（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8月6日下午8时半约清华大学学生谈话。（大约1个小时）

8月10日上午12时半约叶林谈话。

8月16日下午9时约清华大学学生谈话（二批）。

8月17日晨4时约清华临时筹委会成员谈话。

8月19日晚9时半约清华工作组谈话

8月22日上午11时半约叶林、清华临时筹委会等谈话。晚上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

8月27日晚8时半约刘菊芬谈话。

多么复杂的政治！多么繁忙的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时段内，正是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一中全会及然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述有关清华的活动，都是周总理在几乎每天要到毛泽东处开会、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约见中央、国务院部委及各地的党政要员、还有大量必须亲自参加的外事活动中穿插进行的。

有关这次接见的两个重要细节，各个当事人的回忆曾有很大出入。

现在已经比较确定了：

一、周总理接见蒯大富是在哪一天？

曾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 1、在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中是7月30日（见P33）；
- 2、在蒯大富著的《清华文革“五十天”》中是7月31日（见P91）；
- 3、在力平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中是8月1日（见P1128）。

编者认为《周恩来年谱》的说法是可靠的，即是在8月1日。因为周恩来在7月31日和8月1日这两天的活动记录是这样写的：

7月31日
上午10时 （略）
下午5时半 （略）
下午5时3刻 （略）
下午6时半 接见物理讨论会代表
下午7时 出席物理讨论会宴会
晚8时半 陪主席见物理讨论会代表
9时1刻 参加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
晚10时多 到主席处开会
晨2时 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

8月1日
上午11时半 约王光美同志谈话
下午2时半 中央全会开大会
下午5时 中央常委开会
下午6时半 与蒯大富谈话
下午11时 （略）
晨1时 与叶林谈

这是一件无可置疑的物证，把接见蒯大富的日期、时间记录得清楚明白。

二、周总理在清华甲所接见蒯大富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同学一起参加接见？

也有两种可能产生不同解读后果的说法：

- 1、蒯大富说，只有他一人；
- 2、刘泉、刘才堂说，他们也参加了。

编者基本肯定刘泉、刘才堂等也参加了。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当事人的刘泉、刘才堂对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这样的特大事件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终生难忘的，而且现在有了一件可靠的证据：周恩来7月31日的活动记录上写着：“（8月1日）晨2时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

这里的“等人”，乃指刘泉、刘才堂等是也。

编者认为：周总理接见蒯大富、刘泉、刘才堂等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史上无疑是一件重要的大事。编者之所以把这三位亲历者对同一次接见的回忆整合在同一篇文章里，是为了通过互相补充、印证，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场景更加完整、准确、忠实地公之于众，记录于世。这次接见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亲历者当年的处境、心态、关注点不同，留存到现在的记忆有可能产生缺漏和错位。因此，他们回忆的内容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重要的细节互相矛盾，这些都是不奇怪的，可以理解的。编者非常希望亲历者留下真实的回忆，即使其中含有一些不够真实的成分，又有何妨？

一段历史，没有人记录，就是空白，只能任由后人胡编戏说。

一段历史，只有一人留下记录，那是孤证。孤证不取，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后人很有可能就把他的孤证当做历史，无论这孤证是真实的还是不实的。

一段历史，如果有多人记录，尽管每个人的记录可能都有一点失实的成分，但是后人通过比较、分析、综合，总能得出接近真相的史实。有了历史真实，才有可能进行客观准确的历史分析，也才有可能总结出有价值的历史教训。

所以，文革亲历者把重大事件的真相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文献资料】

## 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

• 解学恭 •

〔王辉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1966年7月24日发出通知，7月27日至30日召开预备会议，8月1日至12日举行正式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解学恭列席了这次会议。他的日记记述了会议的一些情况和会上领导人的讲话。这些原汁原味的记录，对于研究当代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七月二十七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华北小组会：  
读七月二十一日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二十三条稿。

雪峰同志传达主席两次讲话：

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阻碍运动，实际上就是帮了反革命。

六月一日公布聂元梓大字报的办法，非那样办不可。不要怕乱，让乱一阵然后一分为二。现在看派工作组不必要。

你们整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没有感性知识。

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派动刀枪，怕什么。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有人说怕群众包围，就是怕包围，包围了就讲话。无非讲，我是来学习的，研究的，帮助你们的，召之即来。不要怕乱。

工作组进去了二个月，冷冷清清。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这个办法不行，要充分彻底放手发动群众。

两次讲话，很明确，有批评。

八月一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

主席：开会。计划开五天。内容邓讲。

小平：会议开法，今天正式开会。计划五天。

第一，会议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包括近四年来中央全会应该认识的大事。第二，讨论批准中央十中全会以来的国内国际的重大决议和事件，通过。第三，会议写一个公报。第四，撤消彭罗陆杨的职务。

少奇同志讲话：

讲两点：

一、北京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时期主席不在家，主要由我主持。关于工作队问题，我还要讲清楚一下，伯达同志提过三次，不派工作组，派的撤出来。第一次没讨论。第二次伯达提出两条，讨论了，多数人同意派，我也同意，认为党委搞了，没个工作组不好办，这次没有通过伯达同志意见。最近又讨论一次，多数同志不赞成撤，我的观点还是认为机动，是不是撤，看一看。主席回来了，根据主席的意见，最后定下来，决心撤消市委派的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北京市文化革命，派工作组有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文件一长一短的，我也看了，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好意见。

二、十中全会以来，差两个月就四年了。四年来重大的决策要讨论批准。62年主席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这个纲一直执行的，在这个纲下反对了各种错误倾向。在经济方面，执行了八字方针。1963年毛主席提出社教，到现在还在进行，一个十条，一个二十三条。

其次64年，三线问题，小三线问题。三线建设晚了一二年，主席提出来后抓上来了。

再其次，工业上学大庆，农业上学大寨，大学解放军；林彪同志提出大学毛主席著作；学用结合，在用字上下功夫，许多地方也做了。学毛著的运动普遍了，成为广大群众运动。

文化革命运动，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了，1962年主席给彭真、刘仁的信，彭真放了一个多月才拿出来。后来要出来发到一个会议上学习。现代戏、芭蕾舞的演出，一直到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重大的措施。还有彭、罗、陆、杨的问题。去年十二月揭了罗的问题，今年四、五月揭了彭的问题，杨、陆的问题发现的早，杨尚昆问题发现的更早，几个副主任掌握在他手上，采取不动声色的一个一个调开。四个人有四个小组，进行专案，总负责人邓小平同志，事实多，很多。做地下活动，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国内重大的事，还可补充。国际，60年81国会议，61年22大，63年25条。十中全会后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总纲领。63年苏英美签订三国条约，公开点名，写了一年多，到64年赫下台，毛主席讲，22大纲领是高潮，之后就是下坡路，就是这样。

（主席：22大以后没有办法了，三国条约不是高潮。）

赫下台后，我们派人去，摸底，知道了新领导是在国内外同赫一样，没有改变。我们了解了，抵制了。

（主席：他们要求停战。）

他们派罗马尼亚代表来调停。毛主席说：三个月不行，三天也不行，打笔墨官司又不死人。柯西金访越过京，（主席：柯西金来，我让了一句，论战少了一千年，九千年了，你还不满意！）

以后，22国以古巴为首的九国代表团来与我们谈判，谈的结果，我们没有答应。主席见了一次，说，有人怕鬼，怕教条主义的鬼，很大的冒犯，冒犯了卡斯特罗，（主席：他投降了修正主义。）之后古巴代表单独找我和小平谈。说是怕哪个鬼。我们没有让步。回去之后，在莫斯科写了公报，回去后向卡（卡斯特罗）报告了。以后格瓦拉来，又问，毛主席说怕哪个鬼，是谁。现在看来，古巴不是因为什么困难向修让步，而是向修投降了。

（主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你们22个党，太少了，你们统统来，欢迎，六十个党统统来，我们欢迎嘛！）

这个期间，朝鲜也是变了的。

日本党来谈，要联合行动，包括苏修。我们说反对统一战线，我早就提了，反美不能包括苏修，因为他们不是反美力量，是别动队，日本回去反了，又反修，又反教条主义。

（主席：反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

越南是赞成联合行动的。派人来谈，事实上他们内部有争论。有美帝国主义，他不能离开中国。黎笋写文章说，反帝就是反修，不反修了，越南是不稳定的。今年七月来了一次，避暑。（这是个机会，谈一谈）谈了多次，到苏谈了，公报上写了一句，造我们的谣，我们没发表。以后他们来谈，总理谈了，为什么苏联造了那么多谣言，你们不辟谣？你们怕苏联，欺侮中国。胡说，欺侮中国他不承认。他想见彭、杨，我就把

这件事告他了，这事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欧洲党都发生了，我们内部也发生了，你们越南就没有？他们报纸上今天宣传封建时代中国侵略越南，这是为什么？是修正主义。美国轰炸河内你们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除了高射炮之后，准备轰平上海、北京。

（主席：三年解放战争，城南庄天天炸，一个人也没炸死。他们要我走，我就不走。）

实际上是轰炸河内，如果没办法，准备同美国谈判的。从这一系列问题谈到他们内部有修正主义，准备联苏反华。

（主席：我也给他讲了。七十六了，要去见马克思，你那个党不出修正主义？）

到杭州见了毛主席，又谈了一次。他问你们怎么发现高、饶、彭、罗的呢？我们开始发现一些现象，以后就查本质，搞小团体，地下活动，和党的路线方针不一致的，这就能发展，也不会冤枉的。谈的中间，他插了几句，说，你们怀疑我们欺侮中国，向美国妥协，觉得伤心。话说的太重了。最后提出这样一个劝告。没有美帝就会变向。

（主席：北京变得这样，没有什么了不得，中宣部垮了，人民日报批评了多年，他就是不听，扫帚不到，灰尘就是不走。5月30日陈伯达这个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走。）

总理到了阿尔巴尼亚，谈了。阶级斗争根源，他不承认，承认有阶级斗争，不承认有阶级。（主席：有些错误，不是主要的，原则的。）社会主义不向共产主义前进，势必退到资本主义，不进则退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正在那里搞革命化，军队搞革命化，工业、农业也在搞。正在前进。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巴基斯坦对我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对他们也有援助。

日本党恐怕要分裂。

印尼问题。930事件。反动派利用了，打击了中间派，杀了几十万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站起来。还没有工农的纲领，路线。在这样大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拥护纳沙贡，依靠苏加诺，直到现在，还不丢掉苏加诺。个别党的组织不听话了。我们估计，革命者是要起来的。反动派占了优势，破坏了两国关系。有二百多党员去中国是避难性的。

陈伯达：少奇同志刚才讲，承认了错误。我们都没经验，我们这些人都是书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是做些调查研究。我们觉得用工作组办法，不能搞文化革命，把朝气蓬勃运动压下去了。

今天主席批了彭小蒙几个小同学的大字报，不能不高兴，毛主席的接班人，他们所作所为使人感动。

工作组，包括我在内，不了解文化革命，不比人家水平高，反而要领导人。不只一个地方，大量的单位，压制革命。我们文革小组不能把下情反映到上边。还有主席在杭州给我打电话，“过早的派工作组，对我们的文化革命并不利”。我记得这句话，又看到目前情况，是一种逆流。走了相反的方向。工作组中有许多好人，但是不懂得，又不学习。毛主席讲，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个革命的传统，工作组记不得，好（多）人也可能记不得了。我常说我是很整脚的书生，搞文字资料，写几篇整脚的文章。老了，不行了。有一点可以保持青春的，就是当群众学生，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毛主席比我们年纪大，就是不断总结经验，站得高，想得远，把我们党的理论不断的提高。文化大革命给老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先当群众学生，后当群众先生。马克思讲过，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工作组不受教育，先要教育。

（主席：90%以上的工作组，方向是错误的。）

把群众压下去了，反认为胜利了，实际上是失败了。我们要警惕这一点。官大了，年纪大了，很容易倚老卖老，这样就脱离群众了。我们现在有一批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脱离群众，

（主席：脱离一下还不要紧，你反对群众，镇压群众，吃上三顿饭，去镇压群众，派出工作组的老爷们，不要官行吗？做官当老爷，说不得自己，只能听好的。）

把我们会领到错误道路上去。我们这些人都是蠢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为是蠢才，就不听，就不好了。从生产队起，都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书记，不叫书记就发脾气。60年春到广东调查，叫部长听的人很高兴，我说，一律叫部长好了，叫客人高兴。一个叫首长，很高兴。主人、客人都高兴。在天津，也是这样。其实，有些青年团就不喜欢叫什么部长。这是官气。主席讲，是做官当老爷，还是当老百姓的学生。领导跟群众结合，反对做官当老爷。

前天人民大会堂大会。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宣传部，聂荣臻同志都是逼上梁山的。这么大的运动，出现偶然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那天大会就是偶然的。

（主席：我们也不是批评张际春，是让他紧张。）

那天的会开的并不坏。不要以为事先没有谈得好好的开了万人大会，就认为不好。只要大的方向没有错误就是了，小的事慢慢弄清。大革命中，随时可能出现偶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质彬彬……”。这种偶然，可能经过我国科学事业发展，掀起一个革命的。偶然性料不到，（主席：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中的，聂元梓出大字报，你没想到会广播、出乱子。）但是也同必然性联系的。

主席：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高明，只有群众才高明，工农，本质，我们的意见从他们那里来。聂元梓等四同志我想见一见。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开两小时。陆平没有敢做的事，工作组做了。工作组做了坏事，一不会斗，二不会批，三不能改，起了阻碍群众革命的坏作用，90%的工作组是不好的，不是再看一看的问题，已经两个月了嘛！

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半小时一个人，两小时。

八月二日

李雪峰：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问题。

一个多月的运动，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强调，过于信任、依靠工作组，犯了错误。6.18事件，看了材料，作了两派学生争取领导权的判断，或者说是干扰运动的判断。这就引向了学生与学生的斗争。

对张承先工作组，采取了说服的方针，没有觉悟到阻碍革命的普遍性，没有觉悟到自己讲话所作的错误判断。又过两周，发现北大工作组没有执行我们的指示，以后又提出了批评工作组。

（主席：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工作下去的，犯了今天的错误，我也是个保皇派。）

保护工作组的错误。以后提出革命的大演习，也没有用工作组限制联系起来。迷信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主席讲过，工作组缓派一步；中央文革小组提过几次，我们也没想通。

其次，提出一个恢复党团组织。虽然强调不是恢复旧组织，讲了主席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进去就三结合，彭真的三结合。虽讲了，许多地方没有这样办，等于恢复了旧领导。这个起了阻碍运动作用。犯错误的原因，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想过历次反右经验，没有想到今天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情况，也没想过取消工作组这个问题。

其次也有繁琐哲学观点，如调查研究，没有强调普遍性，只强调蹲点方式，形势不同。23条会议时主席批评过我讲的繁琐哲学。以后改了，提出一个小工作组大积极分子队伍形式。农村也没全改。到城市又犯了繁琐哲学。我们集中全力，一切为了前线，把工作会议缩短了。听了一些反映，动摇了，奔忙于各种事务。强调北京的主战场。

总之，还是不善于大胆的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不敢放手走群众路线。也有一个首都观念，怕出乱子。框框很多。

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很不容易。老干部也需要很大力量学。

薄一波：作两点检查。

一是工交口，在我主持下派了十几个工作组，大都犯了方向性错误。对工作组交待的不清。我派工作组是积极的。对工作组的作用，历史上反复过多次。根本没想过工作组进去后会阻碍文化大革命。最近才认识到，主席指出工作组根本不适应今天这种形式。在主席指出后才认识了。对群众相信不够。不是充分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挑工作组，挑了些做官当老爷的人，一出手就是钦差大臣。群众不能反，一反就跳起来。

不懂或很少懂得群众路线。不是先当好学生再当先生，习惯于行政命令，简单化，瞎指挥。

工交部门突出政治不够，更加不懂文化革命，隔行。帮助，帮了倒忙。

同意，把工作组官统统罢掉，这是有深远意义的。立一个榜样，什么地方出了修正主义，只能是那里的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它。

第二，在具体工作上也犯了错误。6月22日，地质学院传一件事，有一个指示信。于本盛同志来电话说，你们的副主任李人林讲的话是否对？在电话记录上注了我的意见，大体上：一、李的意见是对的，应同

左派一起闹革命；二、如果说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过去代行职权；如果有人再夺权，就等于夺了党的权；三、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应当批评。

6月25日，在学校广播了。我很苦闷，批评了工作组。并要求学校再广播，要求撤消我的讲话，并指出我的讲话是错误的。起到了压制民主的作用，性质是严重的。

我希望党给我处分，罢了我领导文化革命的官，下去蹲点，向群众学习。

主席批评我粗、浮、少（少马列主义），我检查跟毛泽东思想少。有决心跟。

周恩来：十中全会到现在，不论国内外大事的决策，不论国内社教文革，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来审查我们的工作。

1962年，靠毛主席思想克服了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修正主义动摇。不管哪一次大事，都是毛泽东思想指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的大字报的公布，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大革命。

几年来的整个发展，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建设进入一个大高潮。

1963年在第一个十条时，主席讲挖掉修正主义根子。1964年，五个接班人条件，1965年23条，重点是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今年，革命的造反，小将们都懂了。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深处，一切旧思想……都要革命，建立起新思想……。自己要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去，只有在毛泽东思想下，才能推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林彪同志提出大学毛泽东思想，意义深远。广大群众，特别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向前进，打烂旧的束缚，就得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看到我们的希望。我们要向群众学习，必须学。四分之一的人口搞好了，对世界就是大影响，四年来的成绩反映了这个思想，公报上要反映这点。

其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老一辈人一见到新鲜事物，第一次往往是错误的，这是董老讲的，我深受感动。如同一波讲的，我们这些人冲口而出的话，对新事物不了解，就是一种习惯势力。

我们求教于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但是任何人都要到实践中去考验，你是否真正懂得了在实践中学。旧的习惯势力，几千年，在人们中存在着，扫帚不到他不走，绝不能掉以轻心的。旧脑筋，新运动，老革命，新问题，工作组就是个新问题。首先要不乱，首先敢引火烧身，把自己的旧东西放到一堆去烧。和平十八年了，做官当老爷，习惯于行政命令，脱离群众。不认识任何运动的主人是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师生是主人。青年犯点错误是可谅解的，可理解的。

决定派工作组，近百人，一声令下，就奔赴前线，这种精神是好的。可是我们没有给交待政策，交待了就可能不同得多。绝大多数发生了包办代替，学生老师就起来抵触。这怎么办？绝大多数是好的，坏人干涉是次要的。6.20前后，差不多都有一些事件，都反对工作组，有拥护的，有反对的，学生同学生斗了，把斗改批任务放到一边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所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伯达同志两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好好研究。直到主席回来，我们还是主张工作组不撤，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在常委工作，我们要担起这个错误，虽然也听了市委的汇报，有些是假情况，深刻批评一下是有好处的。

对形势的估计上有错误。对工作组作用估计高了。60万人游行，一天就准备好了，这说明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

因此，我们大家都放到这个火热的文化大革命洪炉中去锻炼自己。上午小组会，下午大会，晚上到学校中去，这是很重要的学习。

机关文化革命也要象学校一样，选出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不要老是什么党委，领导下命令。把自己摆进去，把十七年来做官当老爷的恶习统统烧掉。我们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到实践中去。犯错误是难免的，犯了就改。

陈毅：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几天一学，变化很大，到今天也不能说我已了解了文化革命。

到学校去看大字报，知道了许多事，是做官当老爷所不能了解的。外语学院有四十多张大字报，基本上把办学问题说清了；有120张大字报把历史说清了。外语学院中彭真设了一个语言学院，我根本不知道。

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那些校长们，就是不读书，不研究，不同群众商量，我们有很多和他们相类似的地方。

张彦事件是对我一个沉痛的教训，他在华东局时，和饶漱石很接近。到北京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到外办，八年，朝夕相处。跑腿、办案都不差，从来在我面前不提反对意见，（我）很相信他。这次派他到外交、外语学院去，就是他出的大乱子。在紧要关头，阶级斗争本质才暴露出来了。不能无条件的信任一个人。

机关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个经济委员会，可能监督领导更好些。

李先念：工作队犯了方向性错误。我这个口子派了一个半工作队。外贸学院党委垮了，派了工作队。现在查了一下，压制民主是普遍的。打击了左派，斗争方向错了。

我的思想上支持工作队的。就是怕乱。要横扫这个思想。当时派工作队，自己觉得很认真，很理解，很得力的。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多怕，特别是怕群众，尤其是学生这个群众，一触即发。我们落后了。究竟辩论到什么程度，就不压制民主了？这个界线至今搞不清楚。反工作队就是反党。错误严重就在这里。

八月三日

刘澜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多月以来，也派了工作团，在实际工作上犯了方向性错误，特别是交大的问题。

大量派了工作组，绝大多数师生说是革命的障碍作用。

西交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了6.6事件。判断上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如彭康事件，6月5日召开了秘密会议，内外线进攻。这个材料是一个干部子弟反映的，因此确信无疑，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实际不是。是把一个革命左派李世英打成了反革命。

把斗争矛头引向整革命师生，越是反对工作组的，越围攻的凶。打击了李世英，以至自杀。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行。发现之后，处理不及时，不果断。

1、对形势估计错误，特别是广大师生的觉悟，尤其是学毛泽东思想，心明眼亮，我们估计不足。许多怕就是从这里来的。

2、经验主义，迷信老一套，深信工作组。没有不派工作组的思想。

3、做官当老爷，没有亲上前线，调查研究，没有第一手材料。

所有经验教训，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离开广大工农兵，就学不好毛泽东思想。

今天开五万人大会，取消工作组，放中央录音。然后学校开大会。

工作组撤而不出，开门整风，接受批评，停止活动。

不派工作组的批评，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不是信任群众问题。

群众可以直接通天，任何组织不得阻拦。

主席：不破不立，不破反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立马克思主义。镇压革命津津有味，不破怎么立。工作组镇压学生革命，不破怎么立文化革命小组。

宋任穷：跟不上主席思想。这次工作队问题又跟不上。文化大革命中是两个字：怕，敢；我们怕乱，怕造反，怕什么呢？中央没有让我们派工作队，我们派了，就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破，怕群众革命。大庆油田不怕乱，公开号召要乱出一个水平来，比我们高明的多。陈锡联同志说，“情况不明决心大”。不派工作队是个战略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派工作队去才造反，不是办法。

日程排得满满地也是压学生的办法。

（主席：不上课给饭吃，让他们闹革命嘛，我们这里冷冷清清，没人来是个怪事，不如国民党，国民党还有学生浩浩荡荡去请愿。）

我们怕学生串连，怕的很那！做官当老爷，怕群众。也有些人怕战争。

（主席：把架子放下来，不要摆老资格，什么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什么中央局，什么部长，放下架子就好办了。）

工作组撤出了。

（主席：走不了的去扫地嘛）

有些学生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主心骨。

（主席：两个月了，就是阻碍运动。）

工作组撤出，又来了个小动作，非常顽固。

李井泉：同意主席对工作队的指示，进一步理解了主席的指示。四川校党委书记、校长有50%以上是有问题的。已命令撤出工作组。工作组思想不很通，“进的及时，撤的正确”。

（主席：这样一来就差不多了。）

两个问题：

一个是搞大民主问题。主席讲，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怕群众，怕民主。在几个大字上很不理解。58年主席批评过我们，不许阻拦群众，这次我们办了，但道理没有懂，如这次派工作组。对大民主不理解。派工作组就是与大民主对立的。工作组一到学校就跃跃欲试整学生。在北京叫扫清障碍，排除干扰；我们那里叫维护秩序，统治者总是要强调维护秩序的。

二是工作组权力问题。

23条上没有规定工作组权力。现在人们的习惯好似工作组就是最高权力。最高权力是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工作组赋予最大权力，是反马列主义的。工作组一走就是夺权。

可以考虑城市工矿企业工作组问题；农村包办代表也是多的。值得考虑。工作搞得慢，可能与包办代替有关。工作组权高一切，不对。工作组多担些责任，把左派和干部子弟解脱一下，这是一个问题。

魏文伯：也派出了许多工作组，还认为是适应群众的要求。

四不怕：一不怕引火烧身；二不怕大字报大辩论；三不怕乱；四不怕反革命。

八月四日下午

总理：主席那里开了会。我讲讲，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说，从姚文元文章到聂元梓，到主席这次回来撤销工作组200多天。看出一个路线问题，敢不敢发动群众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当权派，不管地方的、中央的。这次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敢于造反，就是要发动群众起来敢于革命。怕什么，北京市乱了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雪峰、吴德几个人去了，一声号召就把权夺过来了。一个学校，学生一动，即使坏人钻进去，那有什么可怕。彭真这样的事，一揭开，就解决了。怕什么，就是怕乱，怕把统治秩序搞乱了，这就不合主席历来思想。就是要维持原来的保守秩序，实际上站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有了这个根，必然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这点我们有责任，不能怨新市委、工作组。今晚到清华开大会，两万人，你们愿去听的就走。不要怕破，束手束脚。由于这个原因，新市委面临这个局势，各单位党委不被信任是自然的。当时要求派工作组，我们也派了，也报告了主席。认为派了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维持旧秩序。

六月初，看来是好形势，估计错了，怕乱。工作组去研究搞什么？没有去想要工作组支持群众，而是维持秩序。北大6·18事件，错误估计为反革命事件，并通报了全国，清华蒯大富事件也搞错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回来，纠正了。文化革命群众运动引到错误方向，这是根本错误的。方向、方针、路线错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我们革命几十年了，犯过那么多错误，青年才闹革命，左一点，右一点，或一点错误，就不让犯，不让革命了。

团中央在中学工作上，本身还有直接责任。团是党领导的，但团有直接责任。中学生闹革命，出一点事不可免。

还有蒋南翔，在清华十四年，犯了那么大错误，现在去肯定会带高帽子，游行。过一段后再去，这是保护，但是你，必须过关，自己交待修正主义一套。

雪峰：刚在主席那里开了一个会。主要的刚才总理说了。总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两个月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大革命。是个立场问题。什么阶级观点，立场不明？明白得很，就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许多材料说明，就是对革命群众冷酷的斗争。

什么新市委不能批评？新市委可以反，中央也可以反，我们这里就有牛鬼蛇神。有牛鬼蛇神就要反。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就触不得。我们自己是牛鬼蛇神，反掉了好嘛。自己不是，你怕什么。怕上街、怕示威。57年经验就忘了。右派的东西我们都不怕，我们自己的东西又怕什么。什么怕乱，就是怕触动自己。群众短短几天革命，你就怕得要死。不是马克思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是路线、立场问题。修正主义统治了那么久，你就不怕，群众起来几天你就怕得要死。你怕是什么。所谓怕，怕这怕那，都是害怕触动自己，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讲到团中央。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搞了这么久，干什么？就干了一件事：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主要是这个。三胡也可以罢官。你（富春）可以去嘛。

晚清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历来是镇压学生革命，现在我们也镇压革命。自己决议，发了社论，都不算数。十九号批了北大的报告。

（少奇说，我批的。）

镇压群众革命，同北洋军阀、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什么方向性，就是方向错了。明明白白是路线错误，还说什么方向性错误。自己发的命令，群众起来革命，什么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是假的是暴露。

不准学生上街、串连，这是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是“中央”发起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抢枪，抢广播电台，就是反革命抢了，也没什么可怕。

我是不相信你们真正赞成民主。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都是假的。

对无产阶级没感情，对资产阶级有感情，真相暴露了。从中央到地方，对无产阶级没感情，对资产阶级有感情。你们和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彭真、陆平有什么区别。

什么“三胡”糊里糊涂，不是糊涂，明明白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革命。

不能怪工作组，不能怪干部子弟、保皇派，怪我们。暴露了我们的原则——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

徐向前：要彻底改造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怕群众，怕提意见，提了意见就不得了，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这点要好好向主席学习。不仅北京市委，我们军队也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天天学社论，学不进去。

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

十一中全会结束。

主席：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明年要开了。委托政治局常委会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过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决定上写的那样，还要看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广大革命师生是支持我们的。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决定于在座的各位，各级党委去办。比如群众路线，就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群众路线，一条是反群众路线，终有一小部分人是不实行的，经过这次会议，可能比过去好些。过去没有公开的决定，现在有了，并且有了组织的保证，组织的改组，政治的，书记处调整了。

有的同志犯错误，要给犯了错误的同志以出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让人家改正。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我看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过几个月，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次会是开得好的。

周：通知几件事：

- 1、文件不收，简报带回去，各大区、省市留一下，明天有会。
- 2、农业机械化问题，到现场去开了会，参观，讨论了一下。要同各大区各省市谈一下。



林彪同志：这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领导的。会议结束时主席又作了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不久，就被阻挡，中途停顿，倒退下来，主席出来扭转了这个局势。文化革命小组起了重大作用，得以重振旗鼓，打垮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人们思想、精神面貌得到大的改变。组织上的解决，保证今后工作更加落实。

散会。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5月号

~~~~~

【往事非烟】

鬼门关下的徘徊——被遗忘的516

• 王克斌 •

（作者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留校。本文记载作者及其同事在1971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遭遇。——编注）

1971年大年初二的下午，栗乃志到家找我，要我和他去看望一个工人学员，西安262厂的林秀臣，他家在沙滩附近。然后，又到东四5条去看望物9的曹同乐，他正好从鞍钢回来与清华的同学陈怡结婚，在同乐家，吃过晚饭，各自回家。

这是我和乃志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活动。我父亲见了他后，还对我说，乃志眉宇宽阔，是个沉得住气，能做大事的材料。但是我仿佛觉得，乃志那天，似有心事，不象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快言快语。或许，他当时已经从清华校党委会上获得了一些信息，感悟到大难即将降临，比我提前挎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惜，他没对我说什么，10天后就仓促地走了。

1971年2月1日，星期一，从平安里乘班车来到昌平的北大200号后，发现气氛不大对头，有点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感觉。在全连大会上，军代表作了动员，要轰轰烈烈地开展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伟大运动。警告我们的连队就有不少516兵团的成员，必须老实交待，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516集团的重大罪行是反军乱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

会后，工宣队的小李师傅立即找我谈话，要我老老实实交待各种罪行。我一下子傻了眼。一年前，我曾通过反反复复的政治争斗，悟出了三句警句，即从年轻时开始注意，一不犯政治错误，二不犯经济错误，三不犯生活错误。有了这三条，我就可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地做人。怎么一下子让我交代起罪行来了。我开始还觉得，这或许是种误会，不知不觉地做过什么错事，检查一下就完了。于是，开始了长篇的回忆，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写到工宣队进校，斗私批修。把五次去南昌办联络站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工宣队不相信我的交待。成立了专案组，和几个人组成的专政小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由。这时我才感到没那么简单，大概真的完了，但还是停留在“墨悲丝染”的天真水平上，担心会给我的历史上留下个污点。

局势进展得很神速，一两天的时间，我已经不能坐下来写检讨材料，每天要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回答问题，交待罪行。当我说我出身贫穷，能上大学，感谢党，而且争取入党时，他们就指着我狠狠地说，你是要混进党内。当我说我到赣南营前的独立营去促进军民关系时，他们就说我要当营长。时不时地有人领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王克斌老实不老实？”，“不老实！”，气氛之热烈与冷酷，让人不寒而栗。

我的专政小组有新工人（70届毕业生）蔡建新，他是最积极和最可怕的，还有杜彦从，王东光等；干部里有刘桂林，他是背后出点子的；数学教师武继玉，还有几个海军，陆军，和工农学员。经常在半夜里，两点钟左右，被揪出去批斗。蔡建新和刘桂林似乎欲置我于死地，我当时认为，大概因为他俩都是414的人，对井冈山团派有怀恨之心，而且蔡建新向栗乃正争取过团支部副书记的位置，没有如愿，把我整垮对他是个机会；我们几个新工人在反右倾回朝时伤过刘桂林等知识分子干部，这次运动是再好不过落井下石的好机会，还能落得运动中积极热情的评价。

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插队的农民学员黄玉兰。拉练期间，她亲眼看到，我是如何地虚心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不怕吃苦，和她一起宣传鼓动，应当算是战友了。可每次开斗争会，她都按耐不住对我的刻骨的阶级仇恨，带头高呼着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我大惑不解。除玉兰，陆军262部队的刘树坤，张殿勤，北综厂工人师傅孙宗胡，海军干部陈新华也都是旗帜鲜明，铁面无情的。尤其是那个湖南人陈新华，他在审问时，会让你觉得受了侮辱。

楼道里每天战鼓隆隆铮铮作响的都是针对敌对分子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整个宿舍楼像是被泼了一层发烟硫酸，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浓烈气味。让你觉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却无处栖身，只好束手待毙。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和“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从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一个紧跟毛主席的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一下子沦落为反革命，吃饭、睡觉都像犯人一样被人看守着，不分昼夜，随时揪出来批斗，厉声审问，拍桌子瞪眼。我不光是接受不了，简直是一种折磨和煎熬。这些精神上的折磨让我坐卧不宁，乱了方寸。当时我一怕姐姐、姐夫知道这件事，给他们造成麻烦，她们都是党员。二来忽然想到，串联时我因为好奇，留下了几粒半自动步枪的子弹，这的确是不清的大问题。由于恐惧，疑虑和不安，造成了精神上的混乱，失去理智和判断能力。一天夜里，大概凌晨3点左右，我正面对10几个人的无情批斗，刘桂林来到敞开的批斗会门口，和办案人员交头接耳，切切私语，但又隐隐约约能让我听到一些。我误以为他们把我姐姐和姐夫找来了，这意外的精神冲击，使我成了被夜审的潘洪，失去了控制能力，哇地一声，哭了。说“我交待。”于是，我把那几颗子弹的事说了出来。刘桂林的招数果然见效，斗争会胜利地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我在蔡建新和王东光的押解下去抄家。父亲和母亲都在屋里坐着，见我低头不语，神情呆滞，知道我犯事儿了，眼睁睁地看着我打开一个木箱，两位解差一件一件地搜寻着可疑的物品。父亲患有半身不遂，本来手就哆嗦，这下哆嗦得更厉害了。蔡，王二人搜出一把我在武斗时用锉刀磨成的匕首，在江西串联时写的文章的底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歌词，乐谱，一盘录音带，一个红五星解放军的帽徽，一张军人通行证，和联络站的印章。可是没发现子弹，我问父亲，见过几粒子弹没有，他颤微微地说害怕出事，早就扔到天坛北门的茅房坑里了。

然后，父亲和母亲焦虑不安地看着我被押解着走出家门，连一句话都没敢说。我这时才感到一场生不如死的感觉，在公共汽车上，就想着用什么办法来结束这条失去了希望的生命。在昌平等公共汽车时，我想钻到一辆大卡车的下边，来个撞死，简洁，痛快。于是我借口要到对面的厕所去小便。可是，蔡，王二人紧贴着我，不离身，让我失去了死在路上的机会。

回到北大200号的宿舍后，我计划着用一根背包绳，一头挽过来系个活套儿，套在脖子上，绳子绕过枕头上边的床棱，当成一个定滑轮，再把另一端系在右脚上，入睡时右腿弯曲，等睡着后，不知不觉地往

下一伸右腿，把自己在睡梦中勒死。正在我思虑着何时动手的时候，大约半夜一点多钟，楼道里传来了大嗓门的武继玉的叫声，‘栗乃志跑了，栗乃志跑了’，整个楼道顿时骚动起来，过了几分钟，传来了栗乃志跳楼自杀的消息。我的宿舍马上增派了几个海军学员，一起严密地监视着我。

我顿时失去了控制能力，再也躺不住了，只穿着短裤和背心，站在宿舍里，当着几个看守的面，觉得浑身上一阵哆嗦痉挛，上牙和下牙不住地嘎嘎碰响，那时节，我说不清是害怕死亡的突然降临，还是痛惜失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还是因为我差一点死在了栗的前面。相比之下，乃志死得壮烈，我过于犹豫，晚了一步，苟且偷生。乃志人没了，但他的精神还活着，我人活着，可精神上却已经死了。应了中国人常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思念着好友乃志，却不敢流出半滴眼泪。

第二天一早，全连开了大会，有好几个人发言，口诛笔伐，声讨栗乃志。骂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和人民对抗到底。与栗乃志素有芥蒂的军代表王贺宇宣布开除栗乃志的党籍。那时的领导和革命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见了棺材都不会落泪。一个大学毕业刚刚半年的小伙子，就是有罪，也罪不当诛啊。他失去的不仅是生的权利，他也失去了死的自由。会后，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姓王的教师指着我说，“吓了你一身汗吧。”他说对了。

然而，整死了人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专案组色厉内荏，改变了以往气势汹汹的打压手段。栗死后的那个星期六的上午，蔡建新过来问我，想不想进城回家，我说，“你们让我走，我就走。”乃志的死带来了我的自由。如果没有他的以死相拼，我可能两个月甚至半年也回不了家了，那时，我的老父，老母大概也会因担忧害怕而过世。

不管栗乃志的主观动机如何，他是我，也是我家的大恩人。这几十年，无论走到哪儿，我也没忘过他。在那次清查中，连队里整了10来个人，包括一年前跳进地沟淘粪尿的4个新工人，何元金，张良驹，栗乃志和我，还有原来414派的周宏余、桂立明等。栗和我的问题最严重。我的主要问题在于成立井冈山兵团驻赣联络站，全校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军事调查提纲就是我在江西翻印的，不知是联络站的哪位同学把它交了上去。但是反军乱军的事情，我们一件也没有做过。

专案组的人还跟我说过，我们江西联络站的账目是最清楚的，抄家时发现的那盘录音带都是和地质学院争夺办三司联络站的长途电话录音，也没有什么反革命证据。回家后，我对姐夫讲述了这次进了鬼门关的不幸遭遇，他形象地引用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跳车的没有，可疑分子的不少。”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516兵团，也不知道哪个人真的加入过这个组织，一笔糊涂帐，造成了那么多屈死的冤魂。

痛定思痛，为什么栗乃志会死在我的前面，大概是因为他的心理压力大，他不仅是纳新党员，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因而他将要失去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包袱太重，压力太大，因而横下一条心，走上了不归的路。

而我连党都没入上，没有政治上的负担，大不了，我一辈子入不了党，但我还是原来的我。再加上，想到抄家时，含着眼泪，满面愁容的老父老母，他们还得靠我去赡养，因而在自我了结时顾虑多，下不了狠心，让乃志抢到了前面。幸亏去年夏天因为有人贴给我父亲一张大字报，我没有领到入党志愿书，因而没有被开除党籍的心理负担。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感谢贴大字报的作者，虽然他想加害于我的父亲，虽然让我永远地失去了入党的机会，但是帮我留下了一条生命，也留下了我们一家人的温暖。

听专案组的华如星说，从日记里发现，乃志在九大后思想一度灰暗，因为他妹妹那时自杀身亡，家里还有孀居的老母。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两个孩子都死了，白发连哭黑发两次，好不凄凄惨惨戚戚。乃志死后的当天，尚未收尸时，他的在白氏坊工作的党员哥哥来到北大200号，连尸体都没看一眼就走了，大概是怕惨不忍睹。听说，乃志在2月中的那天夜里，乘着没人看守，把背包带拴在暖气片上，从二楼窗口顺着

绳子溜了出去。马上跑到旁边北京大学的宿舍楼，从5层楼的楼顶，头朝下，栽了下去。有个北大的小青工下夜班回来，听见一声绝望的惨烈嚎叫，在地上留下一滩鲜血，结束了一个刚刚踏上征途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生命。

在清查中，工宣队依靠的都是些文革中的逍遥派，他们在文革中织毛衣，焊收音机，回家休息，他们自然是清白和干净的。后来，这些人入党的入党，提干的提干。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清查516运动中对敌斗争立场坚定。而像我这样当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要紧跟他老人家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甚至出生入死的人却成了反革命，成了阶级敌人。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秋后算帐，把这些摇旗呐喊，煽风点火的小喽罗、小猢猻像鸡和狗一样随意宰杀。

和历朝历代的冤案一样，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这些热血青年当初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听了中央文革的话，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如今出了事情，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些年轻学生却提前成了牺牲品和殉葬人。作为一个想贡献出满腔热血的青年，多么可悲，多么愚昧。那个年代，打死人都不偿命，逼死人就更不用说了。那几个当官的，入党的，用无辜亡命人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顶子和党票。后来，才知道，清华井冈山原来分配出去的几个总部委员也也被揪回学校，接受批判审查。

清查516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运动，被整肃的有千万之多（1）。尤其是在学校和科学院系统，大学生多的单位，斗争手段凶残，旷日持久，先抓后查，大搞逼供信，制造莫须有的罪状。死人最多。仅清华大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5人自杀，还有的自杀未遂。这场运动是继反右斗争后的又一大冤案。所谓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不过是文革群众斗群众的翻版。从王，关，戚，到陈伯达，康生，乃至四人帮，他们煽动年轻人做了过火的事情，到头来又把这些盲目的追随者一网打尽，心狠手辣，置之死地而后快。

80年代后，不少同学又被旧帐重算，被当作三种人审查了数年之久（2）。幸好我此刻已经来到美国，躲过此劫。这批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为毛主席文革贡献了青春，想不到又都成为历史的罪人。

从小学到大学，家里勒着腰带供我读了18年书，刚刚有了工资，能够侍奉父母，刚刚进入社会，刚刚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正想着要为祖国效劳。可是才工作半年，就遇上灭顶的灾难，让老父老母跟着一起担忧受怕。一个生龙活虎，无所畏惧的青年，一下子坠入到失望的深渊，变得深沉木纳，心寒胆颤。按心理学的说法，一个正常的人把眼睛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会超过5分钟，而我却常常两眼发直，盯住一个地方长达20分钟以上，几乎到达了呆傻的地步。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王府井的旧书店去卖书，然后去买烟买酒，消散我的哀愁。

我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常常顶着风，厉声疾呼：“安得金勺入心窍，一举尽将忧思掏。安得豪雨扫世尘，克斌得以重做人。”我已经决定，从此，要趴在地上过日子，免得再被打倒，重陷囹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专政撤了，但事情还没有完结。专案组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一方面三天两头地对我政策攻心，让我老实交待。有时还像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一样拍着桌子大喊大叫，步步紧逼。由于恐惧心理，每次找我攻心后，我都像《林海雪原》里的小炉匠栾平说，“我想想，我想想。”于是又有了下一次。过了两三个月，没完没了地追问，我有些烦躁，就说：“就这么多了，想不起来了。”没想到，这招还挺灵，后来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了。

那一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杂，小青工扔下一把纸屑，让我这个反革命去捡。我在察看一个440V变压器时，一个复员军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把电源线插到了220V的插座上，我左手触到了输出端，啪的一声左臂被电打得甩到一边。我也不敢声张。我继续尊重工宣队，碰到他们时，还想打招呼，直到贾师傅恶狠狠地问我：“干什么？”我才知道我的身分，不配和工人阶级讲话。同学结婚办喜事，也不敢叫我出席。整个北大2000号里，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讲话，他就是北大历史系的张泉田，我们是在南昌串联时认识的，他当时在北大的政工组工作。每天晚上，都陪着我在院子里散步，开导我，怕我想不开。

当然，我也没有白白地挨整。有了这次夺命的经历，我获得了自杀免疫力，跨过了这一劫，我面前再没有过不去的坎。不管将来再遇到多么激烈的运动，我都要挺过来，能挺过来的才是英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你态度越好，遇到的麻烦就愈大。我提前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认识到这场文化革命是扭曲了人类本性的大灾难，夫妻离异，父子反目，每次揪出5%的群众，无情地批斗。当然，我只能默念在心。

到了1976年天安门4—5事件时，我什么也没交代，没遇到任何麻烦，因为有了对付运动的政治经验，你若说了去过天安门，他们就会咬定，你抄了诗。我知道了，不再听信任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再为别人去卖命，命是属于我自己的。直到1973年9月，教研组的头头刘桂林才在两年多的调查后，为我定案，一般错误，不入档案。他问我要不要向全组宣布，我说不必。

用量子力学的语言说，我像一粒自由电子，突然落进一个无穷深的势阱，头上是一层一层数不清的束缚态的能级，永远也见不着天日。我只能在这位阱的下边，吃着、喝着、呼吸着，维持着行尸走肉的生命。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希望。我有时问我自己，你为什么活着呀？我找不出原因，只好按牛顿的惯性定律解释，因为我还活着，所以我活着。当时我的确有些过于悲观失望。7年以后，我终于等到了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头悬梁、锥刺股，通夜苦读，聚集了所有的能量，最后终于贯穿了清华大学这个让我哀莫大于心死的势垒，考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又见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找到了希望，找回了青春，找到了重新做人的方向。

{1} <http://zyzg.us/thread-221117-1-1.html>。

{2} 《潮起潮落》，陈继芳，马小庄著，纪实文学，2011年。

□ 原载《华夏文库》王克斌文集

~~~~~

【书刊评论】

读《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 冠 尘 ·

刘少奇生前留下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就是人民在书写历史。

有人说清华文革是中国文革的绝版样本。我跟文集主编孙怒涛先生说过，清华文革是中国文革的缩影，在中国文革史出版前，我们看清华的文革史就是看中国文革史的导言序言。清华在文革中经历的全过程几乎涵盖了中国文革的全过程。从驱赶工作组，到所谓的教育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除了第一张大字报，文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环节，它总是走在最前面。（教育文化层面上的。九一三不在此列，后期的工业，农业，外交，军事不在此列。）

清华始终是文革“路线斗争”上层交锋的滩头阵地，无论毛一刘，毛一邓。最先的战斗都是在这里打响。真正是绝版。全国没有一个单位是这样完整的演绎文革的。这不是清华的光荣，是清华的耻辱。知耻近乎勇。现在清华人反思文革是在为这所著名的大学雪耻，洗刷那十年浸透它身上的污泥浊水，还其清澈华美的原型，如同那座校门。

看这本文集，最容易形成的印象是，在整个文革中，整个清华，两万多学生教职员工没有一个不是受害者。只有受害的深浅不同。从蒋南翔到陶德坚，从刘涛、贺鹏飞到蒯大富、沈如槐（注），从史明远老师，到李磊落同学，……。整个运动没有赢家。可是看看人们的回忆，这些受害者从人的角度说，有哪一个坏人？何以命运至此？

反过来看那些施害者，又有哪一个是生来的坏人？即使那些打过人的凶手“狗熊”吴慰庭，砸过校门的痞子，同学的回忆，说他们本质上也没有干坏事的基因。最后都落入可悲的境地。命运又何以至此？

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文革中清华几乎人人都想投机，从人变成了政治动物。顺杆爬是最方便的捷径。天下太平时紧跟蒋校长反右；工作组进驻，积极反蒋旋即参与围攻迫害蒯派；红八月紧跟形势打老师毁校门，骄横愚蠢地把老子的业绩当儿子的光荣、明目张胆地欺压弱势。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刘少奇失势便智擒侮辱王光美；工作组一撤，群雄并起，清华园更是形成角斗场，人人争当誓死捍卫的革命左派，唯恐落后，身体力行。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看不懂他们的祖辈父辈是怎么狂热得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何成了义和团一样的群氓暴民？他们完全不懂建政以来左倾为害的惨烈。不懂为什么在中国左的一套特别容易成气候。邓公说，中国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痛定思痛的远见卓识。

有些人还以为今天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正是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要解决的社会矛盾。正如张比说的“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也误以为文革前和文革中有平等和民主，要以文革的方式去反腐败。因此文革借尸还魂，再来一次的危险性并非不存在。为了防止历史悲剧再度重演，我们也有必要尽力让真实的文革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揭穿有关文革的种种神话。”（反思集230页）

清华人的回忆反思是一部形象的，同时又是一部思辨的教科书。让人们回到四十多年前，如身临其境看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在指导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就像跟着但丁，把地狱浏览一遍。感谢那一代清华人我们尽到了他们最后一份责任。

林贤光老师的回忆详尽生动的讲述了一个出身诗礼之家，质朴善良的知识分子，由不懂政治也不热心政治，是怎样一步步不由自主被拖进阶级斗争这个烂泥塘，让你一旦陷入，就不得脱身。文革中所有献出了生命的学生谢晋澄、李磊落、钱平华……，无不是一群单纯、上进的青年，也是不由自主的被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看团、四两派的武斗，学生们那种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到头来只落得一句红楼梦的悲凉感叹：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人间还有这样的悲剧吗？

看清华文革这幕大戏，一个个整人者逃不脱先后被整的宿命。蒋南翔何东昌挨整之前，整别人不甘人后，整过的人不知凡几；工作组王光美整完蒋南翔又整蒯大富，忙得不亦乐乎，不料黄雀在后，仅仅五十天后厄运就降临自己头上；团、四两派相互攻击对方不遗余力，恨不能生吃了对方，最后两派输得精光；工宣队进驻，整上面指定的或是自己看不惯的人，温水煮青蛙，持久战无休无止。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的丹东被同是雅各宾党的罗伯斯庇尔押上断头台时说：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后来果然应验。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机构内务部人民委员，双手沾满苏联人民鲜血的亚果尔被他的后任，恶贯满盈的叶若夫枪决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叶若夫接着被他的后任，更阴狠的贝利亚枪决。这些恶棍一个比一个凶残。这是绞肉机自行发展的必然规律。斯大林去世，贝利亚在赫鲁晓夫时代也被枪决，杀戮才终结。

不把所有的人杀绝，绞肉机不会停歇。大革命时期的绞肉机就是雅各宾党自己搭建的。斯大林时代绞肉机的建造也是靠那些作恶多端的内务人民委员们共同完成。甚至包括被他们屠杀的无辜的布尔斯维克也有

份。赫鲁晓夫勇敢地揭露了罪恶，但是没有承担他应负的责任。清华人回忆文革，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们没有把文革绞肉机的建造只推给哪一个人，认识到有自己该当的一份责任。

今天已经八十多岁的林贤光老师说得好：“造成这场浩劫的，固然发动者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参与到这场运动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我回顾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孙怒涛同学写了一本书，《良知的拷问》。我深深感到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自己的良知已经没有了。如今再回顾以往，首先应当把良知找回来，然后无情地拷问自己。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责问自己。……。要是能够真正的认识文革和文革中的自己，我准备花去我余生的精力。认识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对自己的拷问也应当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反思集 2 3 3 页）

清华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你们的反思对清华近几十年的教育多有非议，但是作为非清华人的我还是深深的感觉出，你们这个群体的非凡。

首先，是普遍的忏悔和自省精神、自我批判精神。十分难得。其次是你们对事物穷根究底的认真。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说对了，你们认真的反思文革，相信有人怕就怕你们真的认真。所谓“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薄周之流，唱红打黑归其类也。第三，你们有了和解宽容精神，完成了人生一个境界的升华。第四，你们思索的深度和表述的清晰是一般群体和个人难以企及的。你们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幅清华文革立体的全景似的大画卷，让我们看到文革到底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到底有什么值得追寻的？到底有什么值得再来一次的？答案你们已经给出来了。

这就是我看《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的印象。在一个群体中集体反思，并且反思的程度既广且深，这在别处我好像没有见到。也不是某些人乐于见到的。不看市场行情，做自己应该做的，这也许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吧？你们继承和维护了清华的光荣传统，没有辱没清华这块牌子。是土地好？是种子好？还是园丁好？都是。学校是好学校，学生是好学生，老师是好老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我深自景仰。

2015年5月

注：为什么刘涛贺鹏飞也是受害者？从某种角度说，毛泽东都是他自定制度的受害人，毛泽东的悲剧是这个制度的悲剧。正如前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说的，斯大林也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